学术专论

“大清国”与清朝外交实践中的自我表述

张凌霄

[摘要] 18—19世纪，清朝在外交文书中除了自称“中国”以外，还经常使用amba daicing gurun（大清国）表述，这实际是清朝统治者在外交实践中对国际环境和地缘政治变动的一种因应，以及对中国认同的一种灵活表达。本文通过满、蒙、汉、俄文档案和文献，研究了这种外交实践的缘起及演变过程。18世纪前期，清朝面对新的环境和挑战，开始确立和使用amba daicing gurun这一表述，但此时这一话语尚未普及。19世纪中叶以后，作为弱者的清朝开始在外交文书中普遍在国号前添加amba一词，但很快外国亦被赋予“大”国之称。清朝的这种外交实践既反映了中外关系的演变，也在历史上产生了深远影响。

[关键词] 清朝 中外关系 外交实践 大清国

[中图分类号] K24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8587（2025）－01－0148－13

20世纪中叶以后，以费正清为代表的西方学者提出“朝贡体系”概念（进而衍生出“中华天下秩序”），由此出现了一系列基于这种分析框架的清代中外关系史研究。[①] 在这一学术脉络下，许多学者都强调了传统中外关系的等级制色彩，并进一步聚焦文本中的“天下”“天朝”“华夷”等用语和概念。然而，这一文书制度会随着国际局势和地缘政治的变化做出相应的调整，而这正是清朝外交实践的重要一环。[②] 因此，探究清朝统治者对外交用语的使用和诠释，有助于从微观层面更加深入地理解清朝的外交实践与中外关系的演变，并更加深刻理解清朝的中国认同。

学界已经从清代统治者的政治思想、族群观念、疆域范畴等方面对清朝的中国认同给予较

[收稿日期] 2023－10－09
[作者简介] 张凌霄（1993— ），男，山东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研究生，济南250100，brinkings@mail.sdu.edu.cn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朝鲜与明清王朝情报交涉研究”（22CSS017）阶段性成果。

① 虽然目前朝贡体制仍是分析中国传统对外关系的主流模式，但已有许多学者提出修正，相关学术史梳理参见陈尚胜：《朝贡制度与东亚地区传统国际秩序——以16—19世纪的明清王朝为中心》，《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5年第2期；崔熙在：《‘중화제국질서’를 둘러싼 논의의 확산과 수렴：조공체제론과 다중체제설을 중심으로》，《역사문화연구》第65期（2018年）。

② “外交”（diplomacy）一词，本多用于描述近代以来欧洲国家的对外交涉活动，传入中国史学界后，逐渐开始应用于中国古代对外交涉研究。但也有很多学者认为，“外交”一词并不适用于古代中外关系史研究。本文在行文时为免繁杂，均以“外交”描述清代的对外交涉。参见黎虎：《汉唐外交制度史（增订本）》，“前言”，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9年，第1–3页。

为充分的认证。[①] 然而，对 18—20 世纪的清朝而言，除了“中国”（dulimbai gurun）、“天朝”（abkai gurun）等术语外，amba daicing gurun（大清国）亦是当时外交文书中经常出现的用语之一，并成为构成外交文书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②] 迄今为止，少数学者虽注意到这一现象，但主要将其视为清朝国号的一种形式。[③] 林士铉等学者则在“国号说”的基础上，进一步将 amba daicing gurun 的出现同清朝对外交涉联系起来。林士铉认为，这一用语出现于乾隆二十一年（1756）十一月，并沿用至清末；蒙古学者孟和额尔登（Lhamsuren Munkh-Erdene）注意到，清、俄《瑷珲条约》《天津条约》中均有 amba daicing gurun 的表述；日本学者涩谷浩一则在梳理俄罗斯所藏清、俄外交文书时注意到，雍正八年（1730）以后的满文外交文书，有时会在 daicing gurun 前添加 amba，有时则不添加，但他并未给出解释。[④]

上述研究开始将 amba daicing gurun 从国号问题导向清朝的外交实践，贡献良多，但仍有诸多问题尚待探讨。清朝的正式国号为“大清”（daicing），后来何以又在国号前添加 amba 一词？amba daicing gurun 这一用语是否最早出现于乾隆二十一年？国际环境的变化是否影响了清朝的外交实践？ amba daicing gurun 这一用语的出现对国内、国外产生了什么影响？本文通过满、蒙、汉、俄文档案和文献，试图阐明清朝将 amba 冠于 daicing 之前的历史背景及过程，探讨中外关系的演变与清朝外交实践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并为进一步理解清朝的中国认同提供一个新的阐释维度。

一、清朝外交实践中从“皇帝”到“国家”的转变

乾隆五十八（1793）年九月，清朝给英国国王的敕谕开头写道：“奉天承运皇帝（hūwangdi）敕谕暎咭唎（inggiri gurun）国王”；一个多世纪后，清朝致英国国王的国书开头则为：“大清国（amba daicing gurun）大皇帝敬问大英国（amba yeng gurun）大皇帝好”，并自称为“中国”（dulimbai gurun），而不再提及“天朝”（abkai gurun）。[⑤] 这种转变，不仅体现了清朝外交文书体例以及两国地位的变化，还凸显了清朝对外交往的一种历史转变，即从“皇帝”独尊、“国”之不彰到“国”变得日益重要，而这种转变亦推动了清朝外交实践中 amba daicing gurun 术语的广泛使用。

16 世纪后期至 17 世纪初，随着努尔哈赤起兵并建立政权，女真社会经历了从部落到国家的历史性转变，“国”的意识亦随之确立和增强。这种“国”的意识表现在对外交往层面，则是外交文书中经常强调国号。当时的文献中常出现 aisin gurun（金国）、manju gurun（满洲国）的记载，

① 郭成康：《清朝皇帝的中国观》，《清史研究》2005 年第 4 期；黄兴涛：《清代满人的“中国认同”》，《清史研究》2011 年第 1 期；成一农：《从“大清”到“中国”——基于皇朝时期天下秩序的讨论》，《学术研究》2024 年第 8 期。

② 本文中出现的满文转写采用穆麟德转写方案。如无特别说明，文中所引满文文献的译文均为作者自译。

③ 参见张雅晶：《“大清”国号词源研究》，《清史研究》2014 年第 3 期；李勤璞：《驳斥欧立德：关于清朝国号的再讨论》，《文化纵横》2017 年第 6 期；沈丽：《伊通四天：一次特别的满文教学课》，《中国民族》2014 年第 1 期；孔令伟：《清朝的 AB 面：草原帝国还是中原王朝》，载《澎湃新闻·私家历史》，网址：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503645，2023-09-21。

④ 林士铉：《送不出亦留不住的国书——记院藏〈大清国国书〉的满文内容》，《故宫文物月刊》第 386 期（2015 年）；Lhamsuren Munkh-Erdene, *The Taiji Government and the Rise of the Warrior State: The Formation of the Qing Imperial Constitution*, Brill, 2021, pp. 143–144；澁谷浩一：《ロシア帝国外交文書館の中国関係文書について》，《満族史研究》2002 年第 1 号。

⑤《乾隆帝颁送乔治三世第一道敕谕》，乾隆五十八年九月初三日，英国国家档案馆藏，编号：GEO/ADD/31/21a；《大清国遣使出洋考察致英国国书》，《内阁部院档案》，光绪三十一年八月初九日，台北故宫博物院藏，编号：302000009。

后金 / 清、朝鲜间亦因国号问题而多次发生龃龉。[1] 然而随着清朝迅速入关，以往的对外策略发生巨大转变，“国”在外交文书中不再凸显，取而代之的则是“皇帝”独尊，成为对外交涉的主体与核心。

首先是外交文书中，国号逐渐被隐没不书，代之以“皇帝”成为主体与核心。后金 / 清、朝鲜间早期的外交文书，常书“金国 / 大清国汗致书朝鲜国王”。[2] 然而随着两国封贡关系的确立，国号不再被频繁提及，取而代之的则是“皇帝敕谕朝鲜国王”的表述。[3] 即便对荷兰、意大利等西方国家，清朝一般也只书“皇帝敕谕某国”，而未提及“大清”国号。[4]

“皇帝”独尊现象的第二层涵义是，清朝通过君主的尊号来显示其威严和地位，而尊号问题在后金 / 清早期对外交往中，恰恰成为双方争论的焦点之一。早在努尔哈赤建政之初，群臣便上其尊号“天任抚育列国英明汗”，其子皇太极则享有“宽温仁圣皇帝”尊号。[5] 这些尊号不但被用于国内政治，也在对外交涉中被频繁使用。[6]

但并非周边所有政权都认可和尊重这些尊号。察哈尔林丹汗、朝鲜等均曾有意轻视努尔哈赤的尊号。[7] 直到后金 / 清逐渐完成对周边的征服，其君主尊号才得到广泛承认。

君主尊号再次成为问题，则是康熙年间。此次清朝面临的对象，与以往不同，是逐渐向东扩张的俄国。明末，俄国宫廷开始尝试与中国接触，但双方并未有过多联系。顺治时期，巴依科夫（Байков）使团才首次出使清朝。此后，直到《尼布楚条约》签订前，俄国总共五次派出使团，试图与清朝建立长远、稳固的外交关系。除一般所关注的边界、贸易、外交等问题，君主尊号如何书写在两国间引起了长时间争论。

康熙十四年，俄国派遣使臣尼古拉·斯帕法里（Николай Спафалий）出使清朝。使团出发前，俄国外交部门发布了一份训令，专门要求使团要“切实探明汗自称的尊号和头衔”，“向汗的近臣索取汗的衔称”。这一要求后来被清朝大臣奏报给康熙帝。[8] 然而清朝君臣所理解的尊号问题与俄国的要求大相径庭：俄国希望清朝的外交文书能完整书写沙皇（Царь）的头衔，而清朝君主则坚持其“皇帝”身份，同时仅将沙皇称作“察罕汗”（满：cahan han/ 蒙：čaγan qaγan）。[9]

尽管如此，俄国在签订《尼布楚条约》后仍未放弃努力，继续争取清朝接受沙皇的全衔。康熙三十二年义杰斯（Идес）出使清朝，其所带国书书写了沙皇的全衔，而清朝仍旧不予接

---

① 《金国汗致书大明国皇帝》,《内阁大库档案》，天聪八年八月，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藏（下同），档案号：167432-001;《朝鲜王朝仁祖实录》卷 16，仁祖五年六月丁酉。

② 冯明珠主编:《满文原档》第 10 册，沉香亭企业社，2006 年，第 122、123 页；张存武、叶泉宏编:《清入关前与朝鲜往来国书汇编（一六一九—一六三四）》，三民书局，2000 年，第 56、85 页。

③ 《敕谕朝鲜国王李倧稿》,《内阁大库档案》，顺治元年，档案号：060530;《清圣祖实录》卷 297，康熙六十一年四月甲子。

④ 《荷兰国来朝敕谕稿》,《内阁大库档案》，顺治十三年八月二十九日，档案号：038206；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清中前期西洋天主教在华活动档案史料》第 1 册，中华书局，2003 年，第 66 页。

⑤ 冯明珠主编:《满文原档》第 1 册，第 141 页；第 10 册，第 119 页；齐木德道尔吉等编:《清内秘书院蒙古文档案汇编》第 1 册，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3 年，第 13 页。

⑥ 满文《清太宗实录》卷 37，崇德二年七月壬辰，第 39b-40a 页，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小红绫本，编号：113000013；齐木德道尔吉等编:《清内秘书院蒙古文档案汇编》第 1 册，第 191 页。

⑦ 冯明珠主编:《满文原档》第 1 册，第 300 页;《朝鲜王朝光海君日记》卷 139，光海君十一年四月己巳。

⑧ 苏联科学院远东研究所等编:《十七世纪俄中关系（1608—1683）》第 1 卷第 2 册，厦门大学外文系《十七世纪俄中关系》第一卷翻译小组译，商务印书馆，1978 年，第 506、510 页；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清代中俄关系档案选编》第一编上册，中华书局，1981 年，第 29 页。

⑨ 宝音德力根等主编:《清内阁蒙古堂档》第 4 册，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5 年，第 279 页；德米特里·佩修罗夫:《俄华条约集，1689—1881》，圣彼得堡，1889 年，第 7 页。清朝君主虽坚持“皇帝”身份，但在满文外交文书书写时有 hūwangdi、enduringge ejen、enduringge han、dergi ejen、amba ejen 等多种写法。

受。[①] 此后，清朝不但继续不承认沙皇的全衔，而且逐渐不再翻译俄国来文中出现的沙皇全衔。鉴于此种情况，俄方在之后的国书中也逐渐不再坚持书写沙皇全衔，仅书清朝皇帝的尊号。[②]

雍正五年（1727），两国正式签订条约，条约规定："嗣后中国行文俄罗斯，仍照前例盖理藩院印信，递送俄罗斯国萨纳特衙门。俄罗斯国行文中国，盖俄罗斯国萨纳特衙门及托波尔城长官印信，递送中国理藩院。"[③] 自此以后，清、俄两国外交文书往来的基本程序确立，从而在很大程度上避免了尊号争议。[④] 不过这一举措并非雍正朝之创新，而是将康熙中后期以来的外交实践以条约形式确定下来。

康熙四十年以前，在相当长时间内，除皇帝直接对俄国君主和边境官员颁发敕谕外，清朝各部院衙门与俄国间亦有文书往来，其中索额图是对俄交涉的主要大臣之一。但后来，随着索额图在政治斗争中失败并死于幽禁之所，清朝开始要求俄方不得再致函索额图，而是改为行文理藩院。[⑤] 最终在雍正五年后，条约规定外交文书主要由清朝理藩院和俄国枢密院（Сенат，即清朝所称萨纳特衙门）处理，从而避免了两国君主的直接交往。见表 1。

表 1　顺治、康熙、雍正年间清、俄部分外交文书

时间	内容	史料来源
顺治十二年五月二十二日	daicing gurun i hūwangdi hese, oros gurun i cahan han de wasimbuha. 大清国皇帝敕谕俄罗斯国察罕汗	《满文俄罗斯档》，满俄 9，第 1 页
康熙二十九年三月初八日	tulergi golo be dasara jurgan i bithe. oros i nibcu hoton de tehe da ifan de unggihe. 理藩院咨俄罗斯尼布楚城守尉伊凡	《清内阁蒙古堂档》第 9 册，第 64 页
康熙三十六年闰三月二十日	enduringge han i hebei amban bime, hiya be kadalara dorgi amban songgotu i bithe. oros i nibcoo i hoton i da fi lib, ya gu li ca de afabume unggihe. 圣主之议政大臣兼领侍卫内大臣索额图咨行俄罗斯尼布楚城长官菲利普·雅固理察	《满文俄罗斯档》，满俄 2，第 70–71 页
康熙五十三年五月二十五日	tulergi golo be dasara jurgan i bithe. oros cahan han i si bir sy ki ye golo be uheri kadalara da ma tai wiye rek rek rin de unggihe. 理藩院咨行俄罗斯察罕汗西伯利亚总督玛特维伊·加加林	《满文俄罗斯档》，满俄 20，第 192 页
雍正八年正月十五日	大清国理藩院咨行俄罗斯国萨纳特衙门	《选编》下册，第 530 页
雍正十年三月十八日	大清国理藩院咨行俄罗斯国萨纳特衙门	《选编》下册，第 565 页

资料来源：《满文俄罗斯档》，全宗号：02，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宝音德力根等主编：《清内阁蒙古堂档》；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清代中俄关系档案选编》第一编上册、下册。

由上表可见，虽然雍正五年以前即有理藩院与俄国交涉的先例，但彼时理藩院前并无"大清国"字样，其他机构、官员的文书亦只书其名，"国"的意识尚未凸显。但雍正五年以后，理

①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清代中俄关系档案选编》第一编上册，第 148–150 页。

② 参见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清代中俄关系档案选编》第一编上册，第 261、264 页。清廷并非完全不翻译沙皇全衔，有时仍完整翻译俄国来文所写沙皇全衔。参见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清代中俄关系档案选编》第一编上册，第 175、188 页。

③ 德米特里·佩修罗夫：《俄华条约集》，第 67–68 页。

④《恰克图条约》的签订，并不意味两国间再无君主头衔的争议，但一般而言，如无其他因素影响，清朝并不特别在意尊号问题。例如，嘉庆二年（1797）俄国来文告知新沙皇登基，其文内称沙皇为"至尊至仁大君主"（amba ten i gosingga impirator），清朝皇帝只将其视为"俄罗斯人抬举其汗之意"，并未过多追究。见《奏嗣后库伦咨行俄罗斯文书格式遵照圣旨所定办理折》，《军机处满文录副奏折》，嘉庆二年七月十七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下同），档案号：03–0196–3568–024。

⑤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清代中俄关系档案选编》第一编上册，第 207、220–221 页。

藩院咨文则改书为“大清国理藩院”，理藩院的国家属性开始被强调，“国”的意识在清、俄交往中逐渐得到加强。

“国”之意识增强的另一表现，则是清朝在对外交涉中，逐渐重视政权的正式名称——国号，并将其用于咨文、条约、国书等外交文书中。清朝崛起之初，统治者渴望得到周围政权的接受，因此彼时外交文书有意强调国号。但随着清朝入关并适应朝贡体制，正式国号不再被刻意强调，取而代之的或是隐没不书国号；或是不再严格规范清朝的称谓，将“大清”与“天朝”“中国”“中华”等混用。清、俄早期交往的文书中，虽偶有提及“大清国”（daicing gurun/daičing ulus），但国号仍常与“中国”（dulimbai gurun）、“大国”（amba gurun）等混用，西欧国家国书中对清朝的称呼，也多译为 dulimbai gurun 而非 daicing gurun。①

《恰克图条约》签订后，清朝发给俄国的公文开始规范起来，dulimbai gurun 一词虽继续在外交文书中广泛使用，但作为正式国号的 daicing gurun 也开始成为正式公文的标准用语，成为正式公文的标准用语。② 到 19 世纪中叶以后，虽然清朝仍会自称中国，但在正式的外交文件中，开篇均书写国号“大清国”，落款时间前亦添加“大清”字样。③ 这表明，清朝的对外交往完成了从“皇帝”到“国家”的历史转变，逐渐开始有意强调其国号。

二、中央欧亚的竞逐与 amba daicing gurun 的使用 ④

16 世纪末到 19 世纪中叶，清朝的对外关系经历了由“皇帝”到“国家”的历史性转变。在此背景下，清朝统治者面临地缘政治及国际局势的变化，跳脱出传统朝贡体制的窠臼，在外交文书中逐渐采用 amba daicing gurun 表述，以构建符合自身利益的国际秩序。本节将追溯这一外交实践的缘起及实施的历史过程。

17 世纪后期至 18 世纪中叶，清朝与俄罗斯、蒙古准噶尔部（以下简称“准噶尔”）在中央欧亚（Central Eurasia）展开长期博弈，其结果不但直接形塑了边界与边疆，还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了清朝的外交实践及其对国际秩序的构想。在清朝统治者眼中，清朝对准噶尔是“平叛”，准噶尔统治者则被视为残暴不仁、忘恩负义之徒。但双方之间的关系远比清朝官方史学所叙述的更加复杂。⑤ 雍正帝曾宣称：“得尔（准噶尔）土地、人众、部属，与我大国（amba gurun）亦

---

① 宝音德力根等主编：《清内阁蒙古堂档》第 4 册，第 279 页；国立北平故宫博物院文献馆编辑：《故宫俄文史料——清康乾间俄国来文原档》，国立北平故宫博物院，1936 年，第 213、227 页；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中葡关系档案史料汇编》上册，第 31 页；《为遣使到中国拜见乾隆帝事国书》，《军机处满文录副奏折》，乾隆五十八年六月，档案号：03-0195-3434-037。关于清朝将 amba gurun、dulimbai gurun、daicing gurun 等混用的情况，柯娇燕、黄兴涛等学者都进行过讨论，但他们主要聚焦于清朝皇帝的自我认同问题，没有进一步探究对外交涉时使用不同表述的原因。参见 Pamela Crossley, “The Dayi juemi lu 大义觉迷录 and the Lost Yongzheng Philosophy of Identity,” *Crossroads*, Vol. 5 (April 2012), pp. 63–80；黄兴涛：《重塑中华：近代中国“中华民族”观念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 年，第 13-50 页。

② 雍正五年以后，清朝发给俄国的公文，不但首句书写国号 daicing gurun，封套上也书写 daicing gurun。澁谷浩一：《ロシア帝国外交文書館の中国関係文書について》，第 109-110 页。

③ 王铁崖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 1 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7 年，第 58 页；《为照明俄罗斯驻伊犁大臣禁止我方粮食牲畜出界等项事咨文》，《军机处满文录副奏折》，咸丰十一年二月十一日，档案号：03-0207-4455-050。

④ 关于“中央欧亚”概念产生的背景、含义等，参见 Uradyn E. Bulag, “Where is East Asia? Central Asian and Inner Asian Perspectives on Regionalism”, *Japan Focus*, Vol. 3, Issue 10 (Oct. 12, 2005), pp. 1–7.

⑤ 现代学者在清朝官方叙事的基础上，利用多语种史料，从政治、经济、宗教等多角度重新审视了清、准关系。参见乌云毕力格：《康熙二次亲征噶尔丹的满文文书》，《五色四藩：多语文本中的内亚民族史地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 年，第 78-140 页；Д. Г. Кукеев. О некоторых особенностях цинских полиязычных источников по истории ойратов (на примере «Фанлюэ», «Цзоу чжэ»)// *Вестник Калмыцкого института гуманитарных исследований РАН*. 2015. № 1. С. 8–15.

有何补益？”噶尔丹策零则称：“倘若无取我准噶尔之意，劳师数年，乃为儿戏乎？”①

事实上，早在康熙时期，清朝即以“大国”（amba gurun）之威来震慑准噶尔。雍正以后，“大国”表述被更加频繁地用于同准噶尔的交涉。很多时候，“大国”成为清朝的代名词。乾隆帝就曾向准噶尔人宣称：“我大国与尔准噶尔和好与否，定界与否，原实无关体要者。”准噶尔人亦用“大国”直接指称清朝。②

但是，与频频以“大国”自称相左，当时清朝文书提及国号 daicing 时，并未冠以 amba 一词以示威严。康熙三十七年，纪念战胜噶尔丹的碑文开篇即写道：daicing gurun i hūwangdi, ūlet i g’aldan be dailame mukiyebume genefi（大清皇帝讨灭厄鲁特噶尔丹），“大清”仍是传统写法。③同样地，乾隆五年清朝与准噶尔所定贸易章程中，清朝仍只写作 daicing gurun。④这种情况直至乾隆帝征讨准噶尔前夕才发生改变。

18 世纪 50 年代，随着准噶尔陷入内乱，乾隆帝开始转变对准噶尔的战略方针。乾隆二十年，在得到归降的阿睦尔撒纳等人帮助后，乾隆帝力排众议，果断出兵伊犁，最终平定准噶尔汗国。在这一过程中，清朝统治者开始有意在文书中改变国号的书写方式，以向中外凸显清朝的权威。乾隆十八年底，“三车凌”部刚归降不久，乾隆帝即表明无意与准噶尔开战：“近日准夷内乱，堂堂天朝，固不肯乘衅发兵攻取”，其中“堂堂天朝”一语，满文仍写作 musei amba gurun（我大国）。⑤但次年年初，乾隆帝开始在谕旨中自称“天朝”为 amba daicing gurun；年末，乾隆帝向中外宣示准备用兵准噶尔时，进一步宣称：amba daicing gurun dorgi tulergi be emu obume uherilehe（大清国中外一统）。⑥直至阿睦尔撒纳叛乱期间，清廷亦以 amba daicing gurun 自称。⑦由此可见，自乾隆十九年以后，amba daicing gurun 已然成为清朝宣扬国威的正式用语。

平定准噶尔汗国后，清廷无须再对准部宣扬国威，但 amba daicing gurun 一语却被保留下来，成为清、俄交涉时的重要外交用语。乾隆二十一年达瓦齐被擒后不久，阿睦尔撒纳反叛，大批准部属人逃往哈萨克、俄罗斯等处。此时清朝携覆灭准噶尔之威，开始对俄国施加压力，逼迫其交出逃人。在此背景下，理藩院对发给俄国的外交文书亦出现变化。乾隆二十一年六月，理藩院行文俄国枢密院，要求将乌梁海逃人遣返移交清朝，咨文首句写道：amba daicing gurun i tulergi golo de dasara jurgan i bithe, oros gurun i sanat yamun de unggihe（大清国理藩院咨行俄罗斯国萨纳特衙门）。⑧自此以后，凡清朝发往俄国的外交文书，均于国号 daicing 前冠以 amba 一词，

---

①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中国边疆民族地区历史与地理研究中心合编：《军机处满文准噶尔使者档译编》上册，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9 年，第 42、102–103 页。

②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等编：《军机处满文准噶尔使者档译编》上册，第 310 页；《奏准噶尔使者前往西藏熬茶及其商贾来到拉达克地方折》，《军机处满文录副奏折》，乾隆五年九月十六日，档案号：03–0173–1254–001。

③ 满文《清圣祖实录》卷 190，康熙三十七年十月乙巳，第 24a 页，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小红绫本，编号：113000110；《清圣祖实录》卷 190，康熙三十七年十月乙巳。

④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等编：《军机处满文准噶尔使者档译编》上册，第 765 页。

⑤ 傅恒等纂：《平定准噶尔方略》正编卷 1，《故宫珍本丛刊》第 49 册，海南出版社，2000 年，第 9 页；满文《平定准噶尔方略》正编卷 1，乾隆武英殿刻本，第 28b 页，德国柏林国立图书馆藏。

⑥《军机大臣为阿勒泰以外乌梁海追赶车凌冒进我卡故拿获扎木参等著不得畏怯酌商办理事寄信理藩院侍郎》，《军机处满文上谕档》，乾隆十九年二月十七日，档案号：03–18–009–000010–0001；《为将此番准噶尔用兵始末及在事诸臣功罪宣示中外知之事》，《军机处满文上谕档》，乾隆十九年十一月初一日，档案号：03–18–009–000011–0001。

⑦《为晓谕天下处置青滚杂卜之缘由事》，《军机处满文上谕档》，乾隆二十一年八月十六日，档案号：03–18–009–000016–0003。

⑧《理藩院为乌梁海逃人进入俄罗斯境内请俄方缉拿送交我方事咨行俄罗斯萨纳特衙门》，《军机处满文上谕档》，乾隆二十一年六月二十三日，档案号：03–18–009–000016–0002。

蒙文也一并改称 yeke daičing ulus，以凸显对俄罗斯的优势地位。①

乾隆朝的这种外交实践，改变了《恰克图条约》以来两国间外交文书体例的惯例，也使俄国在清朝统治者所构建的政治秩序中居于不利地位，具有深远影响。但是，将 amba 一词冠于国号之前，却并非乾隆朝的创举，而是有其漫长的历史渊源。

事实上，国号前加“大”并非无史可循。最著名者，为成吉思汗所建立之蒙古政权，先后有“大蒙古国”（Yeke Mongqol Ulus）与“大元”（Dai Ön）国号。② 此后朱元璋所建立之政权，亦以“大明”为国号。这些历史先例，加之政权间力量的鲜明对比，促使努尔哈赤、皇太极多次以 amba nikan gurun、amba daiming gurun、amba ming gurun、yeke daiming ulus 等称呼明朝。③ 不过随着清朝壮大并入主中原，这些记录则多被修改为 daiming gurun、ming gurun，有意将作为“大国”的明朝降格为同后金 / 清对等的政权。④

后金政权对明朝的称呼，反映了其统治者对不同政权（势力）在区域秩序中所处地位的一种直观认识。因此，当后金 / 清势力壮大后，也开始在自己的国名前冠以 amba 一词。据《实录》记载，天命十一年（1626）后金致书袁崇焕时，曾自称 amba manju gurun（大满洲国）。⑤ 不过这可能并非原始记录。《满文原档》显示，皇太极时期，曾有将 amba aisin gurun 涂改为 amba manju gurun 的做法。⑥ 无论如何，这些都表明当时已有在国名前添加 amba 的做法。

崇德元年（1636），皇太极改国号为 daicing（大清）。尽管汉文“大清”可能与“大元”“大明”的历史传统有密切关联，但满文国号已成独立词汇，并非如 Yeke Mongqol Ulus 一般之表述，本身不包含 amba 之意。因此，若使 daicing 尊于其他国号，仍须冠以 amba。崇德六年，与清军作战的蒙古贵族诺木齐吴巴什等降清，其降书中有 amba daicing gurun i geren amba ajige beile se（大清国大小诸贝勒）一语，这或许是现存 amba daicing gurun 出现最早的记录。⑦ 不过绝大多数时候，清朝对内外仍仅自称 daicing gurun/daičing ulus，而其他国家的国名（ži ben gurun、ho lan gurun、da si yang gurun）前也未见有冠以 amba 者，⑧“大”国称谓一时间退出了历史舞台。

康熙、雍正时期，随着清、俄交涉日益增多，“大”国之称重新出现，这也为后来乾隆朝的外交实践奠定了基础。清、俄两国官方接触之初，清廷尚未重视国号。顺治十二年（1655）首份给沙皇的敕书，其开头写道：daicing gurun i hūwangdi hese, oros gurun i cahan han de wasimbuha（大清国皇帝敕谕俄罗斯国察罕汗），其中 daicing 一词并未抬格。⑨ 相较而言，彼时清朝更在意皇帝尊号问题，并不在外交文书中有意提及国号。⑩ 但随着两国交往加深，以及俄国来文中不断强调国号，清朝的外交文书也开始书写国名，以至于为了凸显清朝的尊贵地位，出现了 amba

---

①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合编：《清代新疆满文档案汇编》第 28 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 年，第 360 页；厉声等主编：《清代钦差驻库伦办事大臣衙门档案档册汇编》第 18 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 年，第 35 页。

② 参见李春圆：《“大元”国号新考——兼论元代蒙汉政治文化交流》，《历史研究》2019 年第 6 期。

③ 冯明珠主编：《满文原档》第 1 册，第 238 页；满文《太祖武皇帝实录》卷 2，天命三年，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档案号：02-08-002-000001-0002-0061；满文《清太宗实录》卷 1，天命十一年十一月乙酉，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档案号：02-08-002-000011-0002-0042。

④ 满文《清太祖实录》卷 8，天命七年三月，第 28b 页，台北故宫博物院藏，编号：113000001；《满洲实录》卷 3，万历三十七年二月。

⑤ 满文《清太宗实录》卷 1，天命十一年十一月乙酉。

⑥ 冯明珠主编：《满文原档》第 6 册，第 59 页。

⑦ 满文《清太宗实录》卷 55，崇德六年三月辛丑，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档案号：02-08-002-000021-0002。由于现存原始档案中并无该降书，因此《实录》所载是否为原文仍然存疑。

⑧《内阁大库档案》，档案号：167568、038204、038202。

⑨《满文俄罗斯档》，顺治十二年五月二十二日，编号：俄满 9，第 1 页。

⑩ 笔者据《清代中俄关系档案选编》第一编统计，康熙五十年以前的清朝外交文书中，只有 4 份出现了“大清”国号。

dulimbai gurun、amba gurun、dulimbai amba gurun 等多种用法。[①] 但是，相较于一度流行的 amba dulimbai gurun（大中国）表述，amba 置于国号 daicing 之前的用法出现却较晚。

雍正五年，清、俄签订《恰克图条约》。俄方所刊布的满文本中，“大清”被写作 daicing gurun，但策零所奏条约，订约者头衔则为“一统天下之大清国（amba daicing gurun）皇帝所属议政大臣、吏部尚书、内务府大臣查弼纳”。[②] 这应是 amba daicing gurun 首次出现于外交文书中。两年后，雍正帝遣使祝贺俄皇即位，理藩院发给俄国的咨文写道：amba daicing gurun i tulergi golo be dasara jurgan i bithe. oros gurun i sanat yamun de unggihe. juwe gurun i hūwaliyasun doroi meni, elcin takūraha jalin（大清国理藩院咨行俄罗斯国萨纳特衙门，为两国友好之谊，派遣使臣事）。[③] amba daicing gurun 正式出现于理藩院咨文中。但该咨文与乾隆时期的咨文有所不同，amba daicing gurun 并未抬格，亦未成为后来的外交惯例。[④] 直至 18 世纪中叶后，amba daicing gurun 才成为清、俄交涉时的通行用语。

清朝统治者何以在乾隆朝改变原先的外交实践，采用 amba daicing gurun 用语？这与 18 世纪中叶后清、俄在中央欧亚竞逐的地缘政治及清朝国内的政治文化有密切关联。随着准噶尔覆灭，清朝的声望达到新的高度，“天下共主”成为反复宣扬的政治理念。与此同时，俄国并不处于以清朝为核心的朝贡体系之内，乾隆帝也承认俄国亦是“大国”。[⑤] 但实际上，清朝并不愿与俄国平起平坐，不过当外交文书逐渐开始从“皇帝”过渡到“国家”时，单纯书写国号 daicing，已不能与 oros 形成区隔。于是，amba+daicing gurun 表述成为清朝外交实践中的选项，从而可将俄国纳入其建构的政治秩序之中。

清朝的这种做法虽是单方面的外交行为，但俄国很快便意识到其中的政治含义。俄国人很清楚，Дай-Цинъ（大清，daicing）与 Великаго Дайцин（amba daicing）之间存在差异，amba 是国号“大清”的修饰语，而非国号的一部分。[⑥] 18 世纪，俄国由于自身实力并不足以挑战清朝，因而有意忽视清朝来文中的 amba daicing gurun 用语，并未进行公开争辩。与此同时，俄国发给清朝的满、蒙文咨文，仅书两国国号，不曾于任何一方之前冠以 amba（或 yeke）一词。俄文咨文亦只书写 Россiйскаго 和 Дайцинского，不曾添加 Великаго 一词。[⑦] 进入 19 世纪后，随着俄国实力进一步提升，俄方来文开始试图突破这种外交文书体例。当时的外交文书中不但出现过 amba oros gurun 与 amba daicing gurun，甚至某些咨文只在俄国国名前添加 amba，而将清朝国号

---

① 北平故宫博物院文献馆编辑：《故宫俄文史料》，第 194 页；《满文俄罗斯档》，康熙五十三年五月二十五日，编号：满俄 20，第 192 页；《满文俄罗斯档》，雍正四年三月初八日，编号：满俄 5，第 67 页。

② 德米特里·佩修罗夫：《俄华条约集》，第 61 页；《满文俄罗斯档》，雍正五年十一月，编号：满俄 5，第 176 页。

③《满文俄罗斯档》，雍正七年五月十八日，编号：满俄 5，第 12 页。

④ 据班蒂什-卡缅斯基编著《俄中两国外交文献汇编（1619—1792）》一书记载，乾隆五年，理藩院咨文称清朝为 Великого Тайцымь（即 amba daicing），但满文咨文仅书 daicing gurun，故仍应以满文档案为准。见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等编：《清代新疆满文档案汇编》第 5 册，第 355-361 页；Николай Бантыш-Каменский. Дипломатическое собрание дел между российским и китайским государствами с 1619 по 1792 год. Казань: Типография Императорского Университета, 1882. С. 422. 中译本见尼古拉·班蒂什-卡缅斯基编著：《俄中两国外交文献汇编（1619—1792）》，中国人民大学俄语教研室译，商务印书馆，1982 年，第 438 页。

⑤《清高宗实录》卷 892，乾隆三十六年九月乙巳。

⑥ Николай Бантыш-Каменский. Дипломатическое собрание дел между российским и китайским государствами с 1619 по 1792 год. С. 1, 421. 中译本参见尼古拉·班蒂什-卡缅斯基编著：《俄中两国外交文献汇编（1619—1792）》，第 14 页。德米特里·佩修罗夫：《俄华条约集》，第 110 页。需要指出的是，“大清”在俄文中的写法并不固定，还有 Тайджин、Тайцин 等写法，因对文中分析影响不大，故不再一一说明。

⑦ 厉声等主编：《清代钦差驻库伦办事大臣衙门档案档册汇编》第 18 册，第 85 页；《为俄罗斯新汗继位事咨文》，《军机处满文录副奏折》，嘉庆二年六月十四日，档案号：03-0194-3417-025。康熙时期，俄国来文曾自称 amba oros gurun，但需要注意，除少部分表述与后来的 Великаго Россiйкаго（大俄罗斯国）意思相同外，大多数仅表示与白俄罗斯、小俄罗斯相对的大俄罗斯。

仅书写为 daicing gurun。[1] 面对俄方的“逾矩”，处于守势的清朝并未加以谴责，只能默认这种行为，并在抄录俄国来文时依清朝的文书制度加以删改。[2]

清朝在对俄外交文书中采用 amba daicing gurun 的另一重要原因，则是借助国内文书体例来形成政治权威。依清朝惯例，凡有“大”字者，可抬格书写，以示尊崇。[3] 对国号而言，daicing 前冠以 amba，亦可使之在外交文书中抬写，从而尊于俄国（oros）国名。反之，daicing 一词本身虽可抬写，但亦多有未抬写者，[4] 若不添加 amba 而直接抬写，则可能引起外交纠纷。

事实上，清朝抬格国名的做法，很早便引起了俄国的注意。在 19 世纪初的内部报告中，俄国官员曾多次提到，清朝官员将其国名抬写而“不把俄罗斯国家的称号抬格”。[5] 不过直至 19 世纪中叶前，这种做法并未引起大的冲突。然而，随着中外交往扩大，欧美各国已经意识到这种抬格制度在外交文书中所造成的不对等。《天津条约》《北京条约》签订后，各国开始通过外交途径，解决外交文书中与清朝国名不对等的现象。特别是英国，曾多次对清朝不在英国国名前加“大”亦不抬写表示不满。[6] 部分清朝官员虽认为“抬写大英国等字”早在条约中成为惯例，但传统思维和文书制度仍根深蒂固，因此只能向各国解释：“上谕系专谕中国臣民，例不抬写，若国书则无不抬写。即如历次国书内，两国君上，彼此均系抬写。而某大国字样，亦系抬写。况各国条约内所刊，尤足为凭，何致疑有尊卑？”[7] 清朝官员的解释，反而表明了抬写国名所暗含的政治寓意。

三、“大”（amba）国之尊：一种弱者的回应

18 世纪中叶，清朝统治者虽在对俄外交文书中将 amba 一词置于国号前，以尊于俄国，但直到 19 世纪中叶后，清朝的外交文书才更加普遍地使用 amba daicing gurun 表述。然而此时清朝已远非乾隆时代一般强盛，故这种外交实践更多体现的是作为弱者的清朝对西方入侵的回应，而非抱以“天朝上国”心态的狂妄自大。

鸦片战争后，清朝虽无力再与欧洲列强一争高下，但统治者并未就此放弃原有的国际秩序框架。道光二十二年（1842）签订的《南京条约》，其正式版本虽称两国为“大清”“大英”，但为存天朝体制，清朝内部版本仍将“大英”改为“英国”。[8] 类似情况还发生在法国和美国身上。法、美两国与清朝签订的条约均自称“大佛兰西国”“亚美理驾洲大合众国”，但清朝君臣并不

---

① 《为奖赏留班贵国之魏尼亚明事咨文》,《军机处满文录副奏折》，道光十一年四月，档案号：03-0202-4101-039;《函为哈萨克部落交租事》,《军机处档折件》，道光三十年三月十八日，台北故宫博物院藏（以下藏所从略），档案号：174730。

② 《俄为查明收取哈萨克租税事覆咨理藩院》,《军机处档折件》，道光三十年三月十八日，档案号：174726;《俄国厄尔口城报称收到理藩院复信事》,《军机处档折件》，道光三十年七月初九日，档案号：174727。

③ 关于清朝文书遇“大”（amba）字抬格的实例，参见《为土尔扈特吉木巴札木苏等入藏习经请予照顾事咨文》,《军机处满文录副奏折》，乾隆五年五月二十九日，档案号：03-0172-0442-002;《奏报准噶尔熬茶使在藏活动情形及事毕返回日期折》,《军机处满文录副奏折》，乾隆十三年三月初七日，档案号：03-0174-1277-010.1。

④ 宝音德力根等主编:《清内阁蒙古堂档》第 5 册，第 43 页；北京图书馆金石组编:《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拓本汇编》第 61 册，中州古籍出版社，1989 年，第 69 页。

⑤ B. C. 米亚斯尼科夫主编:《19 世纪俄中关系资料与文献》，第 1128、1247 页。

⑥ 顾廷龙、戴逸主编:《李鸿章全集》第 31 册，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 年，第 299-301、305 页。

⑦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文化部恭王府管理中心编:《清恭王府档案总汇·奕䜣密档》第 8 册，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08 年，第 161-165 页。

⑧ 《中英江宁条约·英国女王核签本》,《前清条约协定》，道光二十二年七月二十四日，台北故宫博物院藏（以下藏所从略），编号：910000108001；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明清宫藏中西商贸档案》第 6 册，中国档案出版社，2010 年，第 3673 页。

接受其国名前加“大”字，仅称之为“咈囒哂国”“亚美理驾洲合众国”。[①]

这一时期，尽管与其他国家在汉译国名上有所争议，但“大清”本为清朝国号，故尚难表明清朝欲以“大”国之姿凌驾欧美诸国之上。道光二十四年《望厦条约》谈判期间，耆英起草的满汉合璧国书，则可清晰反映出，当时清朝尚无在外交文书中使用 amba daicing gurun 的意识。

耆英与美国代表谈判期间，为了“羁縻”美国，曾请求道光帝颁给美国满文诏书。[②] 该国书汉文版开头写道“大皇帝问伯理玺天德好”，并未提及国号，但满文版则写道：daicing gurun i hūwangdi fonjime be lii hi tiyan’de saiyūn。[③]“大清国”依旧为传统写法，并未添加 amba，而美国国名亦止写作 ho juweng gurun（合众国），“大”国之称未出现在两国文书往来中。虽然如此，耆英所拟国书仍有重要意义。首先，该国书的体例为满汉合璧形式，开晚清满汉合璧国书之滥觞；其次，该国书虽被称为诏书、敕谕，然其内容与口吻已非传统的下行文书，更接近对等的外交文书；最后，在此国书之后，清朝先后于咸丰八年（1858）、咸丰九年致书美国总统，皆以耆英所拟国书为参考。[④] 因此，道光二十四年之“诏书”，实为晚清后来的国书提供了借鉴和先例。

咸丰八年以前，清朝未再向其他欧美国家递送国书，中西往来文书，亦只有汉字而无满文本，故难以得知清朝是否有意利用“大清”含义的模糊性，从而以“大”国之威凌驾于“外夷”之上。唯有清、俄交涉，双方往来仍以满、蒙文为主。在这些外交文书中，可以明显看到清朝外交实践中的“大”国意识。但是，清朝对俄国彰显的“大”国身份并不具有统一性。一般而言，理藩院（实际为军机处）和库伦办事大臣所拟咨文，多将清朝写作 amba daicing gurun，但其他边疆地区的官员与俄国交涉时，则无在国号前冠以 amba 的习惯。[⑤]

第二次鸦片战争，既是中外关系转变的重要时期，亦是清朝将 amba daicing gurun 全面用于外交文书的时段。通过这种外交实践，清朝得以建构一种特点鲜明、适应时局变化的国际秩序。首先，与对俄交涉不同，清朝在外交中开始广泛使用 amba daicing gurun，并非出于历史渊源和文化传统，而是应对西方入侵的无奈之举。其次，“大”国之称使清朝在短时间内，在外交礼仪中占据优势，但很快其他国家亦被赋予“大”国身份，清朝的外交实践被各国普遍接受。最后，与传统的“大国”“天朝”等用语不同，amba daicing gurun 作为外交用语，并未在《天津条约》《北京条约》签订后逐渐消失，相反经过一定修正，一直沿用至清朝灭亡，影响深远。

咸丰八年三月，在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前，美国政府曾向清朝递交国书，希望能派公使常驻北京。[⑥] 此前，美国代表已数次携带国书，但均未能收到清廷答复。这一次，面对英法的军事威胁，咸丰帝虽极度不满美国总统在国书中自称为朕，亦不接受派驻公使，但仍决定回复国书，以便安抚美国。军机处调取耆英所拟满汉文国书后，先拟定国书的汉文本，再由满屋译成满文，经桂良将国书转交美国代表。[⑦]

---

① 王铁崖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 1 册，第 51、58 页；陈玉环、刘志伟整理：《叶名琛档案：两广督府衙门档案残牍》第 3 册，广东人民出版社，2013 年，第 409 页。咸丰三年前，美国多自称“亚美理驾洲大合众国”“大合众国”，亦有仅称“亚美理驾合众国”之例，咸丰三年后则多称“大亚美理驾合众国”。参见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编：《中美往来照会集（1846−1931）》第 1 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 年，第 16、18、37、104 页。

② 齐思和等整理：《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第 6 册，中华书局，1964 年，第 2900−2901 页。

③ Chu Shih-Chia, Tao-Kuang to President Tyler,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Vol. 7, No. 3 (Feb. 1943), pp. 169–173.

④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清代军机处随手登记档》第 88 册，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3 年，第 37−38 页；第 91 册，第 70 页。

⑤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等编：《清代新疆满文档案汇编》第 274 册，第 142、148 页。

⑥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编：《中美往来照会集（1846−1931）》第 2 册，第 13 页。

⑦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清代军机处随手登记档》第 88 册，第 37−38、44、132、150 页。关于“满屋”，参见张凌霄：《军机处的满伴与清代中枢机构之变迁》，《清史研究》2021 年第 4 期。

国书的汉文本依旧未写清朝国号，但满文本中则写道：amba daicing gurun i hūwangdi fonjime yamirigiya ho jung gurun i be lii hi tiyan’ de saiyūn（大清国皇帝问候亚美理驾合众国之伯理玺天德好）。此处，清朝国号写作 amba daicing gurun，而落款时间处的“大清”亦写作 amba daicing。①值得注意的是，对比道光二十四年的国书，当时清朝国号前不但无 amba，亦未进行抬写，但此封国书则抬写了清朝国号，从而在文书体例上尊于美国。这也是清朝对俄国以外的国家首次使用“大”国表述，表明清朝统治者意欲在失败的国际竞争中，继续维持国家尊严。

不久，清朝战败，被迫签订《天津条约》，国际地位更是一落千丈。在这种情况下，为了维护国家尊严，清朝君臣唯有继续自称 amba daicing gurun。②在中俄《天津条约》中，清朝君主被称作“大清国（amba daicing gurun）大皇帝”，但由于新条约已规定两国行文“俱按平等”，故俄国君主亦写作“大俄罗斯国（amba oros gurun）专制君主、大皇帝”，两国国号也都进行了抬写。③与此同时，在蒙文、俄文条约中，俄国亦写作 yeke oros ulus、Великаго Россiйскаго。④这标志着清朝开始正式认可俄国的“大”国之称。

但此时清朝仍未全面接受海外各国拥有“大”（amba）国称谓。中俄《天津条约》虽在两国国名前均冠以 amba 一词，但同年签订的《塔尔巴哈台议定赔偿条约》中，两国官员的头衔仍写作“大清国（daicing gurun，Дайципскаго）钦差塔尔巴哈台参赞大臣”与“俄罗斯国（oros gurun，Россiйскаго）钦命办事阿庚特”，唯在内部奏报中，清朝被写作 amba daicing gurun。⑤此后，清、俄文书往来，仍依《天津条约》以前的惯例，或仅在 daicing 前添加 amba，或于两国国号前均不加 amba。⑥直到咸丰十年《北京条约》签订，重申清、俄两国行文“彼此平等”，两国间外交文书体例的变更有了法律依据。但至该年年底，清廷才最终决定更改外交文书体例，以示双方对等。是年十一月底，色克通额奏报：

> 再，查从前奴才等与俄罗斯固毕尔那托尔（gubirnator）往来咨文，我大清国（amba daicing gurun）字样无不抬写。此次俄罗斯固毕尔那托尔给奴才来文内，其俄罗斯国（oros gurun）字样抬写，而我大清国（daicing gurun）字样未有抬写。查收到送来新定条约，亦隐约示意更改自大之旧制（fe durun）。嗣后大清国（amba daicing gurun）、大俄罗斯国（amba oros gurun）字样俱一体抬写，是否有当，伏祈圣主睿鉴训示降旨。为此谨奏请旨。咸丰十年十二月十一日奉朱批：已有旨。钦此。⑦

这是清朝内部少有的讨论 amba daicing gurun 用语的记录，也标志着新的外交文书体例真正开始践行。自此以后，在外交文书之中，凡提及国号时，清朝常以 amba daicing gurun 自称，而外国

---

①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咸丰同治两朝上谕档》第 8 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 年，第 153 页；《大清国皇帝致美利坚合众国国书文底》，《军机处满文录副奏折》，咸丰八年四月，档案号：03-0207-4427-051。

② 从纯粹的满汉对译角度而言，清朝亦不得不继续使用 amba daicing gurun 这一表述。中法《天津条约》曾规定，“凡大法国大宪、领事等官有公文照会中国大宪及地方官员，均用大法国字样”，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清朝开始普遍在欧美各国国名前加“大”字。在汉文语境下，“大清”与“大英”等国名完全对等，但在满文语境下，daicing 若不添加 amba 一词，则难以与欧美诸国的国名对等。

③ 德米特里·佩修罗夫：《俄华条约集》，第 131 页。

④ 德米特里·佩修罗夫：《俄华条约集》，第 110、119 页。

⑤ 德米特里·佩修罗夫：《俄华条约集》，第 96、103 页；《奏报中俄大臣办理塔尔巴哈台俄罗斯贸易地方被焚一案片》，《军机处满文录副奏折》，咸丰八年八月，档案号：03-0207-4430-046。

⑥ 《为已将俄中官员所定条约宣谕边民事咨理藩院事咨文》，《军机处满文录副奏折》，咸丰八年，档案号：03-0207-4433-043；《为咨行俄罗斯萨纳特衙门嗣后遣使应先行文库伦办事大臣事咨文》，《军机处满文录副奏折》，咸丰九年三月二十六日，档案号：03-0207-4436-033。

⑦ 《奏报咨行俄罗斯省长公文被驳回及其来文大清国字样未予抬格折》，咸丰十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军机处满文录副奏折》，档案号：03-0207-4452-070。

国名前亦被冠以 amba 之称，并被抬格。① 即便是过去被认为“小国”的朝鲜和日本等国，清朝亦在外交文书中称其为大韩国（amba han’ gurun）、大日本国（amba ži ben gurun）。②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英国曾因清朝文书中未将英国写作大英而不满，日本也曾省略“大”字而将清朝称为“清国”，③ 但绝大多数国家只在意汉文外交文书中国名的写法，而用外文写就的外交文书，与清朝“大”国之称的外交实践更进一步趋向“中国认同”。例如，中美《蒲安臣条约》分别称中美为 the Ta-Tsing Empire 和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中瑞《通商条约》称两国君主为 His Majesty the Emperor of China 及 His Majesty the King of Sweden。④ 与此同时，在外交实践以外，清朝多数士人仍不接受将各国国名抬格，也不愿在其国名前添加“大”字，内、外之间存在一道明显的政治和文化鸿沟。⑤

可见，晚清时期，清朝在外交文书中普遍使用“中国”（dulimbai gurun）自称。dulimbai gurun 表述与 amba daicing gurun 表述有一定差异，但从语言学与政治实践层面，丰富了中国认同。dulimbai gurun 常出现于外交文书的内文中，通常不用于开端和落款时间处，而且 dulimbai gurun 既不冠以 amba 一词，亦不抬写。关于晚清外交文书中 dulimbai gurun 的用法问题，因不在本文讨论范围内，故不再展开。

四、余论

17—18 世纪，随着欧亚大陆的商品、人员、知识交流网络不断扩大，全球性的联系也日益增强，这导致清朝面临着与明朝截然不同的国际环境，其外交实践也产生诸多新的特点。正是在此背景下，清朝统治者除了在外交文书中使用众所周知的“中国”自称外，还在国号 daicing 前冠以 amba 一词，以因应地缘政治和国际局势的变动。

amba daicing gurun 体现了清朝的自我表达与外交实践方面中国认同的灵活性。对内而言，amba daicing gurun 促使官方和民间在原有国号 daicing 的基础之上，对“本朝”称谓有了新的表达，而这与汉文中常见的“大某国”并不完全相同，更能彰显清朝的“大”国之尊。

此外，amba daicing gurun 也影响了满文之外其他语言文字对清朝的称呼。皇太极改国号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蒙文同满文一样，仅称清朝为 daičing ulus。但随着清朝在外交文书中不断自称 amba daicing gurun，蒙文中亦开始出现 yeke daičing ulus 的用法。不仅如此，蒙文于国名前冠以 yeke 一词的用法在清朝灭亡后仍然沿用。1915 年，中、俄、蒙三方签订协约，其中中国写作 yeke dumdadu irgen ulus（大中华民国），俄国写作 yeke oros ulus（大俄罗斯国）。⑥ 察合台文对清朝的称呼，也同蒙文一样受到满文表述的影响。在察合台文中，dāching（大清）本为一个

① 《为咨复大清国王大臣等议定俄商自恰克图入京沿途经商事咨文》，《军机处满文录副奏折》，咸丰十一年六月初二日，档案号：03-0200-3935-003；《为照会奥国派督察院左都御史杨儒出使贵国事照会》，《军机处满文录副奏折》，光绪二十二年，档案号：03-0211-4592-001。

② 李国荣、鱼宏亮主编：《明清宫藏丝绸之路档案图典》第 1 册，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21 年，第 168-169 页；《中日会议东三省事宜条约·全权大臣证书》，光绪三十一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前清条约协定》，档号：91000016200。

③ 《函达所来照会内未经抬写之处应行知照由》，《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档案》，光绪元年八月二十二日，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藏，档案号：01-21-053-01-028。

④ 《中美天津条约续增条款·美国总统核签本》，《前清条约协定》，同治七年九月初四日，编号：910000002001；《中瑞通商条约·瑞典君主核签本》，《前清条约协定》，光绪三十四年六月初四日，编号：910000063001。

⑤ 《奏为密陈通商各码头宜加强管理添设码头官加以保护事》，《军机处录副奏折》，光绪二年闰五月十一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档案号：03-7130-007；赵烈文：《能静居日记》，台湾学生书局，1964 年，第 1552 页。

⑥ 《蒙文约底》，《北洋政府外交部档案》，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藏，档号：03-32-175-03-009。

词汇，但在晚清条约中，却仿效满文而写作 uluğ dāching（即 amba daicing 之意）。①

对外而言，amba daicing gurun 则为清朝传统的外交实践提供了更加灵活的选项。在传统“中华天下秩序”中，中国始终处于唯一的核心地位，无论是藩属还是互市之国，都不能与清朝相提并论。然而，国际政治的复杂性已远非传统的“天下秩序”所能包含，清朝统治者亟须构建一种新的去中心化、等级差异模糊的政治秩序，于是 amba daicing gurun 开始出现于外交文书之中。通过使用“大”国之称，清朝既淡化了传统中外关系中的华夷色彩，又未脱离“有小国之君，有大国之君，有天下之君”的传统观念，② 努力使中国在鸦片战争以后得以继续保有“大国”身份，同时不致因尊卑问题引起外交纠纷。在从传统到近代的过程中，中国认同亦得到了逻辑的调适与自洽。

References

Huang Xingtao. Chongsu zhonghua: jindai zhongguo “zhonghua minzu” guannian yanjiu (Reshaping China: a study of the concept of “Chinese Nation” in modern China). Beijing: Beijing shifan daxue chubanshe, 2017.

Lhamsuren Munkh-Erdene, *The Taiji Government and the Rise of the Warrior State: The Formation of the Qing Imperial Constitution*, Brill, 2021.

Lin Shixuan. “Songbuchu yi liubuzhu de guoshu: Ji yuancang daqingguo guoshu de manwen neirong,” *Gugong wenwu yuekan* (The National Palace Museum monthly of Chinese art) 386 (2015).

Zhang Yajing. “Daqing guohao ciyuan yanjiu,” (Research on the etymology of the term“Great Qing”)*Qingshi yanjiu* (The Qing History Journal) 3 (2014).

***Amba Daicing Gurun* and the Qing’s Self-representation in Diplomatic Practice**

ZHANG Lingxiao (School of History, Shandong University; brinkings@mail.sdu.edu.cn)

Abstract: From the eighteenth to the nineteenth century, in addition to *dulimbai gurun*, the phrase *amba daicing gurun* also regularly appeared in the Qing Dynasty’s diplomatic documents. This phenomenon reflects the Qing Dynasty’s rulers’ corresponding strategy considering changes in the international situation and the geopolitics of diplomatic practice. Based on Manchu, Chinese, Mongolian and Russian archives as well as other materials, this article discusses the origi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Qing’s diplomatic practice. The Qing government had begun to use *amba daicing gurun*, but the discourse was not prevalent before mid-nineteenth century. As a “weak country”, the Qing government used *amba* before *daicing gurun* to deal with negative situation widely since the mid-nineteenth century. Notwithstanding, foreign countries were also soon called “Great” States. The Qing government’s diplomatic practice not only reflected the evolution of Sino-foreign relations, but also had profound influences in history.

Keywords: Qing Dynasty, Sino-foreign relations, diplomatic practice, *amba daicing gurun*

① 毛拉·穆莎·沙依热米：《伊米德史》，抄本，第 11a 页，瑞典隆德大学图书馆藏，编号：Jarring Prov.163；《中俄议定两属缠头商民事宜·汉缠文合璧画押本》，《前清条约协定》，光绪九年二月十九日，编号：910000122001。

② 王柏心著，张俊纶点校：《百柱堂全集》下册，崇文书局，2016 年，第 584 页。